

齐鲁人文

■ 政德镜鉴 ⑩

在他的幕府中，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汪辉祖，从稚嫩青年成长为杰出的幕僚。

对于汪辉祖的成才，他付出了诸多心血，谱就了一段幕主和幕僚的佳话。

胡文伯：名幕汪辉祖的人生伯乐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绍兴师爷活跃于清代政治舞台上，是一个地域性、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。他们通过自身拥有的刑名律例、钱粮会计、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，辅佐了无数的大小主官。可以说，清代许多基层官府的正常运转，都离不开绍兴师爷的帮扶。

汪辉祖作为“一代名幕”，更是绍兴师爷群体的代表和翘楚。他为幕僚三十四年，以善断疑案著称，足迹遍布江浙两省十八个州县衙门。后来他考中进士，任州县官员五年，勤政爱民，政绩斐然。

在汪辉祖的幕僚旅途中，有一位山东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。正是在这位名叫胡文伯的幕下，汪辉祖积累了丰富的刑名经验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师爷。

在胡文伯的故乡海阳，他的遗迹已经无处可寻，他的事迹也不再为当地知晓。但在汪辉祖晚年所著《病榻梦痕录》中，随处可见他对胡文伯的感激和怀念。汪辉祖深情追忆道：“常州太守胡公赏余骈体文，招之幕下。闲以余力律令，如有会心，稍为友人代理臧臧，胡公契翼。比胡公迁苏松粮储道，余与偕行，凡六年，事之关刑名者，皆以相属，则无不为上游许可。”

因缘际会，为官治民

乾隆十九年（公元1754年），汪辉祖开始供职于常州知府胡文伯的幕中。这一年，汪辉祖年仅25岁，胡文伯则是一位花甲老人。胡文伯是汪辉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幕主，也是他服务时间最长、令他受益最深的人。

在相遇汪辉祖之前，胡文伯已经宦海浮沉多年，积累了深厚的为官经验。

胡文伯生于康熙三十五年（公元1696年）。人生早期，他屡次参加山东乡试，却总是名落孙山，最终只被录上乡试副榜。副榜中的学子，不能与举人一同参加会试，只可以参加下届乡试或低级官职的诠选。

胡文伯自知科场始终难进一步。在康熙时代，胡文伯除了不断参加乡试外，也可参加地方学校官员的诠选。

胡文伯的运气不错，很快就成功诠选为济南府学训导。按照清代规制，训导是地方学校的副手，“掌训迪学校生徒，课艺业勤惰，评品行优劣”。

在清代时期，没有科举功名、身居府学训导，往往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居于下僚。不过胡文伯似乎也没有对自己有多大的仕途期许，只是兢兢业业干着本职工作。他任职济南府学期间，“在任六载，士林翕服”，优秀的政绩引起了上级官员的注意。

雍正帝即位后，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。他提拔官员不计出身，曾对大臣言道：“治天下之道惟用人，除此皆末节也。”他选拔任用官员，除了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勉外，还注重官员有干事的魄力。所以他摒弃原有的资格、出身的规定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雍正四年（公元1726年），胡文伯获皇帝“特旨引见”。经过雍正帝的谈话考察后，胡文伯授任河南禹州知州。

此后，胡文伯转任多地，一直在基层辗转，先后做过河北滦州、通州等地共计五任知州或同知（知府的副手）。到了乾隆九年，50岁的胡文伯升任天津知府。

胡文伯上任后不久，就遇到了严重的干旱灾害。他设立赈灾粥铺、发放救济物资，对救灾安民劳心劳力，终于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。但在次年，天津再次遭遇罕见的旱灾，田中麦苗焦枯，百姓颠沛流离。一些灾民逃亡到了京郊附近，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乾隆帝随即对胡文伯的为官能力产生怀疑。

“为人质朴，实心爱民”

乾隆帝令军机处秘密发文给直隶总督高斌，令他如实奏报胡文伯在天津的政绩和能力如何。乾隆帝还告诉高斌，自己听说河间知府徐景曾、天津知府胡文伯二人“谨慎有余，而

才干不足”，认为他们不能妥善办理二府之事。在文报中，乾隆帝着重夸奖了广平知府吴谷、顺德知府玉麟，认为他们两人“办事之才，似较二人（徐景曾和胡文伯）为优”。乾隆帝提醒高斌认真思量，可否将四人互相调换。他谆谆告诫高斌“若徐景曾、胡文伯能胜河间、天津之任，亦据实回奏”。

此时此刻，胡文伯是否胜任知府，高斌的表态尤为关键。

高斌收到信函后，立即将自己平日的考察结果奏报朝廷。他认为胡文伯虽然“气度局促，本非繁剧（繁重事务）之才”，但他“为人质朴，实心爱民，颇有悃悃（至诚）无华之意”。高斌认为天津风俗崇尚浮嚣，以胡文伯作为表率来移风易俗，似亦“人地相宜”。高斌还认为河间、天津二府连年遭遇荒歉，现在服务救灾最为紧要。胡文伯已经对赈济工作驾轻就熟，不必调换知府人选，高斌恳请乾隆帝能够“容臣再加策励，以观后效”。

事实果然如高斌所料。在胡文伯的努力下，天津抗旱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。两年后，胡文伯又向高斌奏称，可在天津府所管辖的今山东庆云、河北盐山两县修砌砖井，用以浇灌抗旱。胡文伯仔细走访，调查清楚每砌一井所需费用，他表示“每砌一个砖井须物料八两银，每口井可灌地五亩”。胡文伯提出，如果能大规模修井，那么“小旱之年，百姓竟可不饿”。此外，他还请求朝廷拨发资金，为缺少耕牛的庆云县购置耕牛。等到耕牛买回后，胡文伯和下属“赶上庆云县”，令该县知县将耕牛分发给无力贫民。按照每家田地多寡，“田多者户给一只，田少者两三户共给一只”。

胡文伯还经过实地调查，发现庆云县土地非常适宜种植枣树，“可助饷粮不足”。往年因为饥荒缘故，许多枣树被百姓砍伐。胡文伯动用府库中的存剩银若干，购置大量枣杏榆柳等树苗，令百姓看管成活。数年后，枣杏可食，榆柳可备材用。杰出的政绩消除了乾隆帝对胡文伯的疑虑。待天津境内安宁无事后，胡文伯调任江苏常州知府。

“得免粗疎之咎，皆公之教也”

江苏常州百姓富庶、文化繁荣，胡文伯在当地公事较为闲暇。在这里，他将年轻的汪辉祖搜罗到幕府之中。汪辉祖在胡文伯幕中一呆六年，深受胡文伯的器重和培养，从一名稚嫩青年成长为通晓刑名的杰出幕僚。

汪辉祖入胡文伯幕，有一段曲折有趣的故事。起初，汪辉祖的岳父王宗闵是将女婿推荐给扬州大盐商程氏作文翰师爷。程氏财大气粗，给汪辉祖开出的年薪高达一百六十两。汪辉祖起初也是欣然答应，但不久后听说程氏对待下属态度傲慢，毫无尊重之意，“（程氏）每坐榻床倚桌南面，客皆侍坐白事”。汪辉祖认定自己无法忍受如此“礼遇”，于是告诉

岳父自己不想去程氏处供职。王宗闵虽然责怪女婿高傲，但又不能说服他，只得替他搪塞了事。

不到两个月，常州知府胡文伯缺一位“掌书记”的书启师爷，曾是胡文伯下属的王宗闵就顺势把汪辉祖举荐过去。“掌书记”在幕僚中级别较低，胡文伯又是清廉的官员，所以给汪辉祖开出的年薪只有区区二十四两。周围的朋友都劝汪辉祖莫要前往，但汪辉祖竟然爽快同意，很快赴任。他对不解者言道：“俸虽少，太守当宾礼我也。”汪辉祖虽然年纪年轻，却已视尊严高过薪酬。

汪辉祖入幕后，胡文伯鼓励他“究心刑名之学”，以便日后成为刑名师爷。汪辉祖勤奋好学，思维缜密，令胡文伯大感讶异，视其为大才。乾隆二十年九月，胡文伯升任江苏督粮道。此时，汪辉祖却突然向胡文伯请辞归乡。胡文伯对他说：“吾遂不能久屈乎？”胡文伯坚持要求汪辉祖留下，并将每月工资从二两增加到十两，整整翻了数倍。汪辉祖看到薪水在一年之内暴涨，难拒胡文伯殷切之意，就随同他赴任。

此后，胡文伯尤其器重汪辉祖，对他的礼遇也在众人之上。每次遇到大事，胡文伯必招汪辉祖前来商议。而汪辉祖所提的建议，也多被胡文伯采纳。不仅如此，胡文伯还常对儿子说：“汪君必不久于人世，异日为国家有用材也，儿辈当师事之。”此外，胡文伯曾写信给汪辉祖，表露出不一样的敬重：“吾宦游垂五十年，所见幕友多矣。能立品端纯，尽心佐理，时时以国事、民事为念如吾兄者，实未有第二人。”要知道，胡文伯是汪辉祖的幕主，还比汪辉祖年长35岁，其儿子也比汪辉祖年长。胡文伯令其子师事汪辉祖，自己称汪辉祖为“吾兄”，可见对他的尊重。

胡文伯不仅器重汪辉祖，还对汪辉祖严加要求，以助汪辉祖迅速成长。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》中道：“公（胡文伯）尝言能思则事成。思之为字，田在心上，田中一十字，四面俱到，缺一面则心有未至。”胡文伯自己就以思虑周详而著称。当时人称呼胡文伯为“三世佛”，认为他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所不用其思也”。胡文伯认为汪辉祖性格开朗直爽，但细致谨慎较为缺乏，所以对他的要求分外严格。

在胡文伯的有意训练督促下，汪辉祖思考问题越来越细致，常能解决众人束手无策的难题。

当时江浙一带流通一种印有“宽永通宝”的小钱。朝廷起初认为是民间私铸小钱，却始终找不到钱币的来源。乾隆帝令江苏巡抚调查扬州上所印年号的来历，借此找到钱币的源头。可各级官府查来查去，此事也丝毫没有头绪。朝廷一再催促，江苏官员焦急万分。

胡文伯也接到了调查钱币来源的任务，他招来汪辉祖商议此事。汪辉祖恰好此前看过别人送给胡文伯的一本《曝书亭集》，此书是清

代著名经学大师朱彝尊的文集。在《曝书亭集》中，收录有一本日本史书，其中的跋文就提到了“宽永”年号。根据记载，“宽永三年”就是当时的明朝“天启四年（公元1624年）”。原来这种“宽永通宝”是在清代早期贸易中，从日本流入的货币。

胡文伯马上将汪辉祖提供的书证材料一并上报给巡抚，然后再由巡抚上报朝廷。汪辉祖立下此功，得到江苏巡抚的夸赞，也令胡文伯对他刮目相看。但汪辉祖却将自己的功劳归于胡文伯的教诲，认为：“吾佐幕数十年，得免粗疎之咎，皆公之教也。”

助汪辉祖研究刑名，参加科考

乾隆二十一年，胡文伯被朝廷派往山东临清督运粮草，汪辉祖因病无法前往。这段时间，汪辉祖再次参加乡试，却又一次名落孙山。后来胡文伯回任江苏道台，汪辉祖再入其幕下。

胡文伯知道汪辉祖家境清寒，就创造机会让汪辉祖学习刑名知识，希望他早日做上刑名师爷，好提高收入。清代幕僚分成多个种类，最重要的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“刑名师爷”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“钱谷师爷”。幕友担负工作不同，收入大不一样，其中最丰厚的当属刑名和钱谷师爷。

刑名师爷不好当。不仅需要精通律例，而且必须掌握司法知识和办案技术，可以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。即使聪明的人没有几年工夫，也是无法学成出师的。常州幕府内有一位叫骆彪的刑名师爷，是个端正方直、精明干练、经验丰富而又乐于助人 的老者。胡文伯就让汪辉祖虚心拜骆彪为师，公事之余跟着他“究心刑名之学”。同时凡涉及刑名之事，胡文伯都让汪辉祖涉及兼顾。遇有案件审理，胡文伯也让他参与讨论。汪辉祖悟性极高，加上勤奋刻苦，很快就能帮助胡文伯处理司法案件。

胡文伯知道汪辉祖有强烈的功名心，因而不仅鼓励汪辉祖研究刑名之学，还鼓励他积极参加科考。胡文伯自己并没有考中举人进士，所以无法在制艺文章上给予汪辉祖指导。但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为汪辉祖介绍名师，鼓励他以文章干谒名师，以提高文章水平。

乾隆二十四年三月，山东昌邑籍进士孙尔周来到江苏探亲，在老友胡文伯的府衙内做客。胡文伯收到孙尔周书信后，特意嘱咐汪辉祖，要他将平日所作制艺文章拿给孙尔周评阅。汪辉祖随即将所作三十篇文章郑重交给孙尔周。

一个月之后，孙尔周始终没有提及汪辉祖的文章优劣如何。汪辉祖心中焦急，却不好直接询问，就将心事倾诉于胡文伯。胡文伯二话没说，立刻找到孙尔周，询问汪辉祖所作文章如何。胡文伯还责备孙尔周因为懒惰，伤害了汪辉祖苦心求学的心。他还告诉孙尔周，汪辉祖的继母和生母辛辛苦守节，将家族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孙尔周闻言大受震动，觉得汪辉祖是个可造之材。胡文伯拜托孙尔周认真评阅汪辉祖的文章。次日拂晓，汪辉祖还没起床，孙尔周就穿戴整齐带着文章前来。

孙尔周非常直率地对汪辉祖说：“子文久闻矣，颇不愧于心。子才可以入彀，而文不合格，妄为誉。”孙尔周虽然觉得汪辉祖文章质量低劣，但觉得他虚心谦逊，是个可教之才，决定将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传授于他。

当天，孙尔周就将汪辉祖所交文章全部作了详细评改。孙尔周讲解得非常仔细，三十篇文章中“有从破题抹起者，有逐句抹者，有隔句抹者”。而在三十篇文章中，得到孙尔周肯定的竟然只有三句话而已。汪辉祖听得“汗流浹背，多不能解”。他真诚恳求孙尔周教授自己作文之道。孙尔周就将文章写作精要一一讲解，汪辉祖觉得自己“闻所未闻”，兴奋地为弟子之礼对待孙尔周。在胡文伯的鼓励下，汪辉祖每办完官务，就到孙尔周处听讲。一连过了两个月，汪辉祖的文章终于获得孙尔周的肯定。

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，胡文伯调任他处。汪辉祖终于辞别，正式转做刑名师爷。



清代“一代名幕”汪辉祖画像

仕途跌宕，高寿而终

汪辉祖离开胡文伯后，在各处官府内作专职的刑名师爷。后来汪辉祖考中进士，出任基层官员，为百姓做了诸多好事。而在汪辉祖退隐林泉后，将自己对幕僚生活的感悟，写成诸多文集，受到后世推崇。而胡文伯的仕途也蒸蒸日上，不断晋升。

乾隆二十七年，胡文伯升任江苏按察使。次年，广东布政使出缺，朝廷派胡文伯补授。

到了乾隆三十三年，朝廷将广东布政使胡文伯调任江苏布政使。此时的胡文伯已经72岁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体力强健，处理政务依旧得心应手。

次年，73岁的胡文伯升任安徽巡抚。到任后，他弹劾贪腐的地方官员，百姓亲切称他为“胡青天”。

但在安徽巡抚任上，胡文伯却和布政使范宜宾产生激烈冲突。范宜宾认为胡文伯年老体迈，因而对他的命令一直推诿塞责。而胡文伯自觉权威受损，对范宜宾也是牢骚满腹。安徽省内一二把手的矛盾甚至闹到了两江总督高晋处。

高晋无法调和巡抚和布政使之间的矛盾，又担心二人不和会影响皖省官场运转，就将此事上奏朝廷，请求将二人调任他省。乾隆帝却认为“抚藩不和，已属非体，而又互有抑扬，不分曲直，尤非持正衡人之道”。他认为如果胡文伯确实日就衰颓，办事精神不到，“又复性情偏急，动辄参差，难以服膺司（布政使）之心……其咎自在胡文伯”；如果“范宜宾向系好事之人，遇地方公务，或意在急图自见。于巡抚不肯受其约束，时露倨傲不驯之气，其过又在范宜宾”。乾隆帝让高晋秘密将二人的具体情况据实禀报。

高晋很快就呈递了奏折。这次他站在胡文伯这边，高晋奏称：“胡文伯性急无私，其驳正藩司误处，并非苛求。范宜宾任事努力，尚欠熟谙，每因巡抚指驳，退有后言。”他认为两人出现矛盾，问题出在范宜宾身上。

胡文伯暂时安全度过了这次抚藩之争。但剧烈的问责风暴，即将向他袭来。

盛夏时节，天气酷热，江淮出现蝗虫啃噬庄稼的灾害。胡文伯觉得自己年老体弱，如今又是酷暑时节，不敢亲自前往，就派人去捕捉蝗虫。而布政使范宜宾坚持要求亲自前往，胡文伯并未批准。胡文伯先是根据派出人员的报告，向朝廷奏报蝗虫已经捕捉干净。但不久范宜宾上奏朝廷，报告许多地区还有蝗虫灾害，而胡文伯也并未亲自前往捕捉。此事令乾隆帝大为恼怒，他在诏书中严厉斥责胡文伯：“似此玩视民瘼，岂能复胜巡抚之任？”他立即将胡文伯降为候补湖南布政使，安徽巡抚由直隶按察使裴宗锡补授。

乾隆三十五年，乾隆帝让已革任的胡文伯补授为广西按察使。即使如此，乾隆帝依旧声色俱厉地斥责他：“胡文伯前为司道时，尚知实力任事。及用为巡抚，即不免器小易盈，愆尤丛重。且其年已衰迈，精神日渐就昏，遇事不能整饬，岂惟封疆非其所宜，即降补两司，亦安望其复堪胜任乎？”

胡文伯虽然补任为广西按察使，但此时的他年事已高，很难在南疆就任。乾隆三十六年，胡文伯来京师接驾。乾隆帝见他精力尚未就衰，认为该员前在直隶年久，著加恩交与总督杨廷璋以同知题补。

乾隆三十八年，胡文伯年近八旬，乾隆帝念他居官尚无大过，加恩赏给按察使衔，令其休致回籍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，82岁的胡文伯在故乡去世，安葬在海阳市凤城街道东迟格庄村旁。

相关阅读 ·

汪辉祖舍弃律令而引入礼制，以仲、言两姓祖先都推崇礼让的精神来说服感化双方当事人。

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族人，瞬间握手言和，互相谦让，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
汪辉祖巧解疑难案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汪辉祖是清代绍兴师爷的代表，尤其擅长处理刑名案件。他就职胡文伯幕府中，很快就从书启师爷涉足刑名领域，并迅速展露出极佳的刑名天赋。乾隆二十三年，汪辉祖协助胡文伯妥善解决了一起积存许久的案件。他处理案件的方法策略、撰写的司法文书，成为古代案件判决的经典范例。

按照汪辉祖《病榻梦痕录》记载，这是一起性质不算恶劣但影响非常大的民事纠纷案件。在常熟虞山中，有两位古代贤者虞仲、言

子的陵墓。其中虞仲陵墓在上，而言子之墓在下。因此，虞仲的后人仲氏族人每次去虞山祭祀扫墓，都要经过言子墓地前的墓道。而言子的后人则认为仲氏每每越界，惊扰了陵墓的清净，因而禁止仲氏族人穿越墓道，要求他们对周围的榛莽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。仲氏族人不理睬言氏的意见，因而发生了严重的纠纷。两家协商不成，又各自在官府中有一定势力，所以官司从县里打到府里，又从府里打到按察使处，再诉讼到江苏巡抚衙门。因为案件离奇难解，积压了十余年都没有结案。

眼见无法平息两家的积怨，江苏巡抚就专

门命令胡文伯妥善处理此事。胡文伯经过初步调查，发现两家都是各执己见，谁也无法说服对方。仲氏家族认为言子的墓地位于虞仲墓地的禁地内，自己从言子墓道旁通过合乎情理。而言氏则依据本族谱牒记载，认为早在汉朝时期，两块墓地就划清界线，不存在自己越界的问题。言氏认为自己要虞氏重新选择通往墓地的通道，而虞氏并不同意，所以产生了纠纷。

胡文伯也拿不出完美的处理办法，就请汪辉祖拿意见。汪辉祖认为：虞氏“墓前禁地之说起于后世，仲（氏）说不足为凭”；

偃，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，也是七十二贤人之一，被誉为“南方夫子”。他曾任鲁国武城宰，阐扬孔子学说，用礼乐教育士民，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，为孔子所称赞。

汪辉祖抓住两位古代贤者的品性，对两家族人进行了动之以情的劝说调解。

汪辉祖认为，按照历史年代计算，虞仲在先而言子在后。虽然两人生活时代相距数百年，却都是品质高尚的贤者。汪辉祖认为“虞以让国而逃，必不爱此区区之地”，而“言为道南文学，礼让为先，必不忍与先贤争路”。由此，汪辉祖判定两家后人因道路问题互相争执，“皆非祖宗本意。若舍正途而另辟荆棘，不惟不便，亦属非礼”。汪辉祖认为应该让仲氏每年展祭时，都从言氏墓道经过。但仲氏必须妥善保护墓道，“墓道之外，不得樵采，庶莫幽魄而杜器风”。

汪辉祖舍弃律令而引入礼制，以两姓祖先都推崇礼让的精神来说服感化双方当事人。仲、言两族看完汪辉祖所写的调解书后，都无话可说。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家族人，瞬间握手言和，互相谦让，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。